

中国共产党十次 路线斗争史

参考资料

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印
中共党史教研室

一九七五年八月

目 录

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
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瞿秋白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0)
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李立三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7)
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罗章龙 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	(41)
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的 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46)
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张国焘 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路线的斗争.....	(72)
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81)
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德怀 反党集团的斗争.....	(92)
九、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104)
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彪反党 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	(117)

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主要内容是四点：一是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三是在同盟军问题上，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还是忘记农民，抛弃农民；四是在武装斗争问题上，是无产阶级掌握武装，还是放弃武装。

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

一九二三年夏天以后，毛主席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基础上，组织领导了革命统一战线。一九二三年六月，毛主席出席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我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革命的迅速发展。

一九二四年年底以后，毛主席又以主要力量领导了伟大的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至八月底，毛主席在韶山地区开展了农民运动，创造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宝贵经验。

一九二五年十月，毛主席到了广州，随后主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在我党领导和推动下，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工农运动日益高涨，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东出发进行了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又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大发展。一九二六年九月，农民运动由组织时期进入到革命时期，掀起了一个全国农民运动的大风暴。这个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力量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统计，党领导的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一千零二十八万人，工会会员发展到二百八十八万人，共青团员发展到六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五万七千九百人。党并掌握了一部分武装，我国出现了一个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正当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向前发展时，党内形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把革命引向了失败。毛主席说：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学习和时局》）

陈独秀1880年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人是知识分子，北大教授。1915年9月因主编《新青年》而出名。十月革命后，他标榜拥护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所以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共产国际两次派代表来联系都是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的。因此陈捞到了资本，由于他的社会声

望和党的幼年“一大”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陈独秀路线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早在建党初期，陈独秀就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陈独秀抛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大毒草，形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抛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反动口号。他错误地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等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再去革资产阶级的命。这就是陈独秀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开始就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时，毛主席就批判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毛主席说：“組織統一战綫的問題上，必須实行堅決的、严肃的两条战綫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視資產階級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錯誤。这种錯誤，把中国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义国家的資產階級看做一样，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战綫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統一战綫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的綱領、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視它們之間的原則差別的錯誤，这种錯誤。忽視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資產階級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

历史证明，党的“三大”决定和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正确的。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我党建议，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重新解释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它和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上相同。所以，毛主席指出：“**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论》）。但是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就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右倾机会主义了。这是因为，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即：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不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宇宙观的不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始终是一分为二的，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因此，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地位，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陈独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合二而一的观点观察国共统一战线，根本看不到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的差别，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

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

爭，我们要着重学习毛主席的两篇光辉著作。

第一篇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革命同反革命的大决战即将来临的形势下，为了反对党內的两种机会主义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一九二六年三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奠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总路线的基础。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斗争的主要问题是五个：

（一）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問題。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因而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他说：“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

毛主席批判了这种反动的观点，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們革命的领导力量。”“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絕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軍閥、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战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主席站在无产阶级立場上，长无产阶级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陈独秀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上，丑化无产阶级，美化资产阶

级。两种观点、两种立場是非常鲜明的。

(二) 关于农民同盟军問題。陈独秀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因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陈独秀还胡说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不受压迫的农民。他说：“中国农民所受压迫，不象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运动。”他还说：地主、富农和贫农生活“并非相差甚远”，所以不需进行革命，只需进行教育和宣传，协议工资和介绍工作等改良主义的办法，就可以解决农民问题。

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这一反动观点，指出：广大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首先，毛主席具体分析了中农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指出其经济地位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他们有三个不同的部分。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在革命高潮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就是右翼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因此，“**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次，毛主席分析了贫农和半无产阶级，指出他们的经济地位是更细小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受着别人残酷压迫剥削，因此“**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需要一个变更現狀的革命**”。**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貧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謂农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再次，毛主席分析了雇农，指出他们

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他们迫切要求革命。因此，毛主席指出：由雇农、贫农、中农所构成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伟大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三) 关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陈独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处处吹捧资产阶级，丑化无产阶级，根本看不起农民，他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并由资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毛主席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他們在受外資打击、軍閥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国主义反軍閥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們又怀疑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既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只是在一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在另一个时期，就有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

(四) 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其前途是发展资本主义。他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

毛主席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前

途是社会主义的前途，政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在驳斥陈独秀企图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反动主张时，说：“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五）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问题。陈独秀说：中国革命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这个公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一个是根本不提农民。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

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这一反动的路线，制定了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主席的这篇著作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只注意同国民党

合作，忘记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阐明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这篇光辉著作是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周密地系统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解决了“**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战略策略。这篇光辉著作象光辉的灯塔一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一九二六年三月以后，在革命统一战线和我们党内围绕着革命领导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1.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国民革命军的海军是我们共产党帮助建立起来的，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是共产党员李之龙。蒋介石在三月十八日，通知中山舰开到黄埔港，听候调用。李之龙按时把军舰开到黄埔港，蒋介石就把李之龙和全部共产党员扣押起来，翻脸不认账，说这是共产党阴谋暴乱。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押了在国民革命第一军、黄埔军校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强迫共产党退出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主席主张坚决斗争，认为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必须坚决反击，党应当采取进攻策略，挫败蒋介石夺取军权的阴谋，从而巩固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巩固党对整个革命事业的领导权。毛主席的英明主张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力量并不大，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他只能控制第一军，其余五个军长同蒋介石都有矛盾。我们党在这五个军中都有相当好的工作基础，同时，有十多万工人从香港大罢工回到广州（其中有二千多工人纠察队），有党能够直接指挥

的广州教导团。如果接受毛主席的主张，我们完全可以把蒋介石挫败。可是陈独秀拒绝了这个主张，说反击会吓跑资产阶级，会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他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我们“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因此应当向蒋介石进行解释道歉。为了讨好蒋介石，陈独秀写信给蒋介石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介石一件反革命行为”，甚至把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说成“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柱石”，“谁反对蒋介石谁就是反对革命”。陈独秀极其无耻地说：“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他，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的反革命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不用不着客气。”陈独秀拒绝了毛主席的英明主张，把军权送给了蒋介石，使蒋介石不但抓到了第一军，而且当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窃取了军权。

2.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作了很多反动的规定。如：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共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等。其目的就是削弱我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把共产党整理掉。当时毛主席主张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右派充当帝国主义工具的反动面目，把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共产国际也主张“必须执行把共产党员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使国民党右派退出或者将他们开除”。这就是说，不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而是把国民党右派开除出

国民党的问题。但陈独秀之流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我们“包办”国民党事务太多的结果，再一次拒绝了毛主席的建议。他主张再一次退让，说“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荒谬方针，并亲自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整理党务案”表示欣然接受。说：“这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赞否。”结果，蒋介石通过“整理党务案”，抓到了党权，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部长，篡夺了党政大权。

3.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当时，我们党在军队中仍有较好的工作基础。但是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在军队中只做政治工作而不能掌握军队的指挥权，胡说共产党员当军官会变成军阀。他认为军队只能有一个领导，就是国民党的领导，如果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军队的领导权，就会破坏国民革命军。所以，他不但不去改造旧军队，相反地要求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停止革命的宣传工作，以免引起军官的反感。因此，在北伐战争中，我们党只是帮助别人发展了军队，如唐生智的第八军，半年的时间就由一万人发展到十多万人，自己则没有掌握多少军权。

毛主席说：“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二六年九月，陈独秀一手炮制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提出了陈独秀右倾投降的纲领。在这个决议案中，陈独秀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过火了”、“过左了”，叫嚷“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规定农民“不可简单地提

出打倒地主的口号”、“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的色彩”等等。他特别起劲地反对工农武装，规定了农民革命武装的四个“不许”：即不许超出自卫范围，只能防御，不能进攻；不许有常备组织，害怕有了常备组织而引起同地主民团和驻防军的冲突；不许用自卫军的名义，以免引起误会和嫉妒；不许搞军事训练。总之，陈独秀不许有农民武装，处处牺牲工农的利益，以适应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

第二篇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六年夏，毛主席离开广州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同年九月，毛主席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十二月初，毛主席从武汉回到湖南，出席了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并发表了两次重要讲话。大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了各种决议，强调指出：农民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农民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民主政权”等等。毛主席还号召大会代表深入地进行社会调查。

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毛主席亲自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并于三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以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运动，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村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伟大战略方针，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彻底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要着重领会四个问题：

（一）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问题。

陈独秀一贯轻视农民运动，反对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他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广大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开头就指出了“农民問題的严重性”。毛主席说：“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問題。很短的时间內，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們將冲决一切束缚他們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检验而决定弃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里，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民是一个几万万人的革命队伍，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力量，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的态度，是区别革命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是检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试金石。

（二）关于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问题。

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为了从思想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农民的各阶层，制定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毛主席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貧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富农的态度“始終是消极的”，革命决不能依靠他们。中农的态度“是

游移的”，但革命高潮到来，他们可以参加革命，党应当团结他们，“向他們多作解释工作”。毛主席痛斥了陈独秀之流胡说贫农是“痞子”、“惰民”的反革命谬论，指出：贫农“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沒有貧农，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击他們，便是打击革命。”“他們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此，党应当依靠他们完成民主革命。

（三）关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问题。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根本的就是要保持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准农民取得政权。陈独秀说：“民团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绅用来以压榨平民，拥护他们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现时就望要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政策是一面对团丁宣传，使不助土豪劣绅作恶，一面对团总人选主张由乡民大会选举，或者其它适当政策，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精辟地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提出“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激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沒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沒有人民的一切。”（《论联合政府》）因此，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又说：“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吓翻

了，那真是胆小鬼！”（《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独秀就是这样的胆小鬼。他对农民武装怕得要死，竭力保护地主武装，反对农民武装。

（四）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痛斥了陈独秀之流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反革命谬论，大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光辉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最彻底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方针。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热情地歌颂群众运动，坚决地支持群众运动，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毛主席说：“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没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两次会议上的斗争。